

德国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的构建： 政策、举措与经验^{*}

唐 慧 谢莉花

摘 要：近几十年来，教育体系融通性成为德国教育政策热点词，这既是教育政策改革的既定目标，也是对未来教育体系发展的美好愿景。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共同促发了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的构建。在德国，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的构建是一个在教育政策支撑下目标动态发展、内涵不断深化的过程，通过资格框架等能力量度工具，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之间统一的能力认可与换算逻辑。其在实践探索中已有重大突破：一方面提供稳定且明确的普通/学术教育路径和职业(教育)路径；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多种可能性的融合路径，既有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双向开放和过渡的传递型模式，又有同步融合职业教育与大学准入资格、学术教育的混合型模式，还有跨教育领域创新性教育一体化安排的聚合型模式。教育体系中的融通机制在不同教育类型、层次之间提供灵活的、多样的教育路径，塑造职业教育与普通、学术教育多层次互动关系，满足个人与社会对教育与职业的期望，促进德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全面形成。

关键词：融通机制； 职业教育； 学术教育； 教育路径； 融通模式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研究助理 上海 201804 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教育学 博士研究生 德国班贝格 96052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副教授 上海 201804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1)02-0054-18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德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应对‘工业4.0’的进程、举措、方向研究”(编号:BJA180104)资助。

教育体系融通性(Durchlässigkeit)这一话题的热度在德国近几十年来公共的以及有关教育的讨论中居高不下：如何促进单个教育类型自身的层次衔接，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转换衔接、开放互认、协调融合，从而提供灵活的、多样的个体教育路径。更好地构建教育体系中的融通机制成为了德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政策部门、研究机构、实践院校等多方主体参与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探析融通机制构建过程中的背景因素、政策支撑、实现基础、实践举措，解读其内涵和特点，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德国面向未来的、蕴含美好愿景的教育体系，从其发展轨迹和构建经验中寻得解锁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密钥。

一、德国教育体系中融通机制提出的背景因素

德国教育体系的发展一直都镶嵌在整个社会人口、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这意味着社会外部因素的强势拉动和教育内部体制的积极转变共同触发了教育体系的变革——构建融通机制。融通机制使得教育体系更加开放、灵活，一方面与社会的动态变化保持同节奏步调，维系着依存关系，另一方面不断塑造内部领域关系，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术教育的交流、衔接与结合。

(一)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一是人口社会的转变。根据德国《第14次协调性人口预测的假设与结果》，就算采用最利好的数据模型和期待较多的移民数量，德国人口结构还是偏离了经典的人口金字塔结构^①，人口总数在当下短期增加后仍会出现下降，出生赤字依然存在，劳动力(20~66岁)有所减少，老年人口持续增加。人口问题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专业人才的供需关系，德国需要借助教育的力量同时在数量、质量上开发技术工人的潜力。

二是服务型、知识型经济的来临。经济部门中的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其就业人数远超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2018年占德国所有总从业人数的74.4%^②，预计到2030年占比仍会进一步增加，商务类、管理类、社会服务类、教育类等工作在就业结构中占据上风，沟通、信息、媒体和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物质性的工业生产到非物质性的服务的道路转向标志着从较多的身体活动向较多

^①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Bevölkerung im Wandel. Annahmen und Ergebnisse der 14. koordinierten Bevölkerungsvorausberechnung*, Wiesbaden, 2019, S. 19.

^② 根据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utschland und Internationales 2019*, Wiesbaden, 2019, S. 361 数据计算得出。

的智力活动的转变^①,劳动所要求的活动类型、主导的知识形式、需要的资格要求均产生变化,尤其是增量人才的知识和资格持有发生相应变化,这均需通过教育体系中知识和资格授予形式转变进行协调和补充。

三是技术的变革与创新。技术革命,尤其是“工业4.0”引起了德国劳动世界中职业结构、任务的根本性变化,劳动过程数字化、智能化一方面使得新职业大量涌现,另一方面使得机器/技术越来越能执行常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技术能够取代人^②,只能表明人在职业活动中的工作任务及/或其比重发生变化,从重复性、机械性任务中摆脱,转而从事知识密集型及技能技术专精型任务,任务更加多样、灵活。德国社会越来越需要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兼具实践性技能、深度知识以及科学-反思能力的人才,传授实践技能的职业教育与授予深度知识的学术教育之间的领域合作尤其适配此类人才需求。

(二)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首先是教育公平的全面渗透。教育,作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应惠及每一个人,教育体系应该赋予公民教育的选择、发展机会,教育的参与机会不应该由社会中家庭背景、收入地位等因素决定。当下德国教育体系却存在较明显的筛选倾向,尤其体现在大学的准入数据上:平均来看,来自学术背景家庭的100位孩子有74位最终进入大学,而来自非学术背景家庭的却只有21位^③。教育体系理应尽可能地消除社会因素引发的偏倚,更加公平、开放、融通,体现教育的功能性平衡。

其次是对教育扩张的合理回应。国际范围、欧盟境内以及德国本国内的教育政策都释放出明确信号,需全面提高教育参与率、提升教育层次。在高等教育扩张大趋势下,德国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必须正视的问题有:(1)2012~2018年德国本科生整体辍学率在27~29%,硕士则处于17~19%这一区间^④,基于2014年大学辍学者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在辍学后迅速进入职业教育,这意味着学术教育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对于一些个体来说,职业教育才是更加合理的教育选择,职业教育肩负起扩张负面效应的消除责任,为此类群体打开入口;(2)职业教育与普通、

^① Martin Baethge, „Das deutsche Bildungs-Schisma: Welche Probleme ein vorindustrielles Bildungssystem in einer nach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hat“, *SOFI-Mitteilungen*, Nr. 34, 2006, S. 13 - 27, hier S. 24.

^② Melanie Arntz/Terry Gregory/Ulrich Zierahn, *The risk of automation for job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89, 2016, p. 9.

^③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Hochschul-Bildungs-Report 2020: Höhere Chance durch höher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17/18. Halbzeitbilanz 2010 - 2015*, 2017, S. 12.

^④ 根据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20 — Ein indikatorengestützter Bericht mit einer Analyse zu Bildung in einer digitalisierten Welt*, Bielefeld: W. Bertelsmann Verlag, 2020 附件表格“Tab. F4-7web 根据大学、专业 and 国别划分的2012、2014、2016、2018年本、硕辍学率”计算得出。